



国防教育丛书

GFJYCS

国防意识与民族精神

张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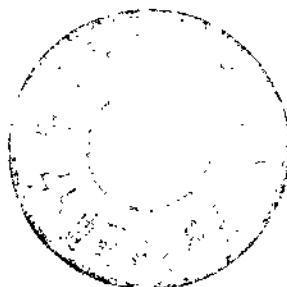
国防大学出版社



GUOFANGYISHIYUMINZUJINGSHEN

国防意识与民族精神

张 之 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

国防意识与民族精神

张 之 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华新科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9·125 印张 196 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北京)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626—0140—2/E·86

定价：3.70 元（平） 6.70 元（精）

目 录

第一编 启蒙：战火中的抉择	1
1. 民族与国家：艰难的生态环境	2
1. 1 漫长的分娩	2
1. 2 战争：严峻的威胁	8
1. 3 国防的最初构建	12
2. 生存危机所积淀的忧患心态	17
2. 1 一柄达摩克利斯剑	17
2. 2 屈辱：民族的昨天	21
2. 3 忧患中的警醒	27
3. 仗剑扶犁：严峻的双重抉择	34
3. 1 防卫的历史课题	34
3. 2 “悖论”：国防负担和国防利益	37
3. 3 明智的选择	41
3. 4 剑与犁：相异的格局	45
第二编 冲突：国防意识的演化	49
4. 从家族观念到国家意识	50
4. 1 悠久的血亲关系	50
4. 2 崛新的国家意识	56
4. 3 艰难的精神转变	59

2760/27

5.	视野的拓展：国土、海洋、空间	63
	5.1 狹窄的视角	63
	5.2 生存半径与防卫范围的思考	67
	5.3 新的国家安全区域观	71
6.	闭关与开放：民族心理冲突	77
	6.1 一种封闭型的防卫态势	77
	6.2 国门洞开后的震荡	84
	6.3 开放的时代与开放的国防	89
7.	爱国：传统与更新	96
	7.1 国家的精神支柱	96
	7.2 “爱国”字眼上的错乱与迷失	101
	7.3 民族狭隘意识的畸变	106
	7.4 新的内涵与新境界	108
8.	富国强兵：理想之路的探寻	113
	8.1 矛与盾的困惑	113
	8.2 国防史上的新足迹	117
	8.3 国富与强兵的双促机理	121
	8.4 兼容：富国强兵的新格局	125
<hr/> 第三编 激励：国防的精神价值		129
9.	精神导向：国防的潜在功能	130
	9.1 战略家的新兴趣	130
	9.2 危机：重塑民魂的压力	136
	9.3 富有影响的教化系统	140
10.	科学：激励效应	145

】

	10. 1 内在渴求与“首用现象”	145
	10. 2 转转：多重价值.....	149
	10. 3 蓬勃发展的科学精神.....	152
11.	大文化潮中的巨流分支	157
	11. 1 丰姿异彩的奇葩.....	157
	11. 2 文化的催生作用.....	163
	11. 3 军事教育与文化传播.....	165
12.	国民素质的锻铸	170
	12. 1 战争、国防与民族素质.....	170
	12. 2 一个高素质的群体	175
	12. 3 辐射式影响	179
13.	标示作用：民魂的强悍与衰靡	183
	13. 1 富有典型意味的折光	183
	13. 2 红色的警告	186
	13. 3 威慑的力量	189
第四编 培育：宏大的社会工程		193
14.	教育与政策：国防意识的传播	194
	14. 1 全民化：一项新教育	194
	14. 2 从奖励军功到优待政策	200
	14. 3 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	206
15.	权利与义务：公民责任感的确立	211
	15. 1 卫国：来之不易的权利	211
	15. 2 义务·义务观念	217
	15. 3 参与，公民职责的体现	220

16.	法规制导：硬功能和软功能	225
	16. 1 大趋势：国防建设的法制化	225
	16. 2 国防行为的规范约制	229
	16. 3 国防意识：强化效果	233
17.	理论：国防意识的深化	236
	17. 1 军事理论的先导作用	236
	17. 2 蕴育着突破的有利条件	241
	17. 3 理论的力量：深化与普及	244
18.	人才培养：国防栋梁的构建	249
	18. 1 “硬件”与“软件”的双重需求	249
	18. 2 历史：对国防人才的呼唤	253
	18. 3 百年大计：一项重要国策	259
19.	完善战略思想：对国防的新思考	266
	19. 1 战略：民族国防意识的结晶	266
	19. 2 时代演进与世界态势的变化	272
	19. 3 深思熟虑后的结论：战略性转变	279

第一编

启蒙：战火中的抉择

内容提要：○当民族和国家从历史的襁褓里问世，面对着的并非是极乐世界。○铁骑奔突的硝烟烈火，使国家和民族处于险恶丛生的生态环境。○遭侵凌，受奴役，国家和民族屈辱的昨天。与此相伴随的，是民族深沉的忧患心态。○防卫：国家与民族生存发展的迫切需要。为此，宁可肩起沉重的负担。○仗剑扶犁，民族的思考与抉择。○国防意识作为人类晚生的一种观念形态，构成了民族精神的重要成份。

1

民族与国家：艰 难的生态环境

1.1 漫长的分娩

历史学家们认为，国防意识是继民族与国家形成之后，人类晚生的一种观念形态。据考古学家发现证实，人类社会的存在，大约有二三百万年的历史。1968年到1972年，在非洲肯尼亚卢多尔夫湖东部地区，发现了大约26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和石器文化，其中最早的约在290万年前。1960年在非洲坦桑尼亚奥尔杜威峡谷，也曾发现过19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这类距今100万至300万年的人类化石和石器文化，在罗马尼亚的布朱勒斯提、法国芝通的亘龙纳特以及中国山西芮城西侯庭和河北阳原的泥河湾等地都发现过。这说明，在二三百万年前，人类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这时的人类，尚处于原始的蒙昧状态。没有民族，没有国家，没有阶级，自然也谈不上什么国防意识。

在艰险丛生的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先人们以血缘纽带为

基础结合成一个个游群，形成了由共同活动联系起来的某种稳定的人类社会生活联合体。最初是原始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的进化，两性关系逐步摆脱了杂交的原始状态，产生了氏族。由于经济活动的发展，几个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又联合成部落。氏族和部落的成员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化、信仰和习惯，还有共同的居住地和狩猎地。这一发展过程，经历了极为漫长的时间。考古材料证明，距今约4万年前，以新人的发现为标志，人类开始形成氏族组织。这以后，随着畜牧业、农业、制陶和磨制石器的出现，氏族制度逐步得到发展。大约在六七千年前，即母系氏族社会的后期，开始形成由若干血缘关系相近的氏族结成的胞族，以及由若干氏族或胞族组成的部落。在人口增加和生产发展的刺激下，部落和部落联盟的规模越来越庞大，逐渐变成了地区性的组织。中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到处都是部落联盟，其中有些部落联盟很大。如黄帝部落联盟是由熊罴貔貅䝙虎6个部落联合而成的，有熊氏部落为之首，雄距今河北涿鹿县一带。蚩尤的9黎部落联盟就是由9个部落联合而成的，相传蚩尤有“兄弟81人”，当为81个氏族。它们分布今河北、河南与山东三省的联接地带。炎帝、神农和黄河下游的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等九夷，都是当时著名的部落联盟。其后轩辕率领黄帝部落联盟击败蚩尤、炎帝之后，又南下打败神农部落，讨伐不服从的其他部落，遂成为华北诸部落的大首领。不仅部落联盟的规模越来越大了，而且这时的部落与部落联盟不再是单纯的血缘氏族的结合，它的内部不仅包括被收养的外族人，还包括奴隶以及被征服

和自愿参加的氏族与部落。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基本上是建立在部落与部落联盟基础之上的。中原地区的部落成员逐渐相互融合，在经济和生活习惯上彼此接近，再经过商至西周将近1000年的长期融合，便形成了华夏族——奠定了今日汉族的前身。

随后，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是中国中原地区民族大融合、大发展的又一新时期，进一步加速了华夏族与其他氏族、部落的融合进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废封建，设郡县，集权中央，又统一了文字、货币和度量衡。于是到了汉代，除了槃瓠等蛮和越人之外，所有春秋、战国时期被齐、燕、晋、赵、秦、楚、吴等国并吞的淮夷等东夷，赤狄、白狄、长狄等狄人，犬戎、鄩戎、义渠、乌氏、大荔等西戎，荆蛮、庸、卢及群舒等，都不见了，它们同华夏族一起，融合成了一个新的氏族——汉族。

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多数都经历了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大约有2000个民族。这些民族人数相差非常悬殊，多的几亿人，少的只有几十人；民族历史的长短差别甚大，长的达数千年，短的刚形成百余年。

民族，是继原始社会生活共同体之后而形成的具有最广泛意义的人类社会生活共同体。在氏族和部落的基础上形成的古代民族，是按地域区分的，而不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它发展了人们共同的经济生活、语言、文化等等，形成了共同的民族语言、民族生活传统、民族心理和感情，是比部落或部落联盟更广泛，更稳定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替代了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后，又形成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民族，如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等等。随着社会

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又相应地形成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民族，如今日的中华民族。在阶级社会中，同一民族中的阶级对立和差别，不会因属同一民族而减弱。但由于民族是一个稳定的人类社会生活共同体，所以使得同一民族中的不同阶级的人们，能够保持某些共同的文化特点和民族感情，保持社会生活中某些共同的需求，共同的爱好，共同的风俗习惯，形成社会生活方式的共同点。

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人类社会还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會現象——国家。

原始社会的末期，经济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向氏族管理组织提出了两大严峻课题。新出现的剥削阶级，在经济上逐步占有了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物质财富，并开始占有和统治了奴隶。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形成了。同时，原始社会末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商品、货币、债权人、债务人、以及商业、手工业等等，“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① 美国著名学者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描写道，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已经有了稳定、发达的田野农业，已经有了成群的家畜，有了大量的商品交易，有了房产和地产”；随之，在古老的氏族领地中，增加了外来移民，打破了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关系；并且出现了“以环形垣围绕的城市”以及“围绕以整齐叠砌石块的城郭”。^② 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并非仅仅是对抗阶级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及其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0页。

② 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第257页。

突，农业、畜牧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冲突，不同地域、不同部族之间的冲突，日益频繁而复杂。这就使得社会生活达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至于原有的社会管理组织——氏族已经无法维持下去，社会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管理组织以满足和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和商品经济的涌流，构成了国家产生的双重基础。于是，国家作为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和阶级社会适当的管理形式，便应运而生了。国家与氏族组织的不同特点在于：国家以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机关”代替氏族、部落的民主管理机构；国家以其地域来划分它的国民，代替了自然形成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国家成为最大的地缘群体。

摩尔根在作了大量考察分析后这样写道：

这种国家建立在地域的基础上，……古代社会建立在人身关系的组织上，它是通过个人与氏族、与部落的关系来进行治理的；但希腊部落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这种原始的政治方式而开始感到需要一种政治制度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所需要的就是创立乡区，环之以边界，命之以专名，并将其中的居民组成一个政治团体。于是，乡区连带它所包括的固定财产以及当时居住于其中的人民，便成了新政治方式中的组织单元。从此以后，氏族成员一变而为市民，他与国家的关系是通过地域关系来体现的，不是通过他个人与氏族的人身关系来体现的。他将注籍于他所居住的乡区，籍贯成为他的市民身份的证据；他将在他的乡区投票，纳税和被征服兵役。^①

① 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第218页。

中国古代氏族公社的彻底瓦解和国家的形成，大约是在公元前21世纪，它以禹传位于启、建立夏王朝为标志。据《礼·记礼运》篇载，禹以前是没有阶级、财产公有的大同社会，禹以后是“天下为家”（变公有为私有），“以设制度”（阶级制度）和“礼义以为纪”（制定礼教和法律）的阶级社会。相传在距今4000年左右，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存在着三个氏族部落，禹是其中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的首领。在他以前，部落联盟实行“禅让”制，即由联盟议事会推选首领的制度。禹死后，夏启正式废除“禅让制”，确立了“王位世袭制”，“天下为公”的原始氏族公社便为“天下为家”的奴隶制国家夏朝所替代。古代文献的记载和考古的成果表明，夏初已具备了国家的基本特征，如将统治区“划为九州，经启九道，”^①并设置了九州之长“九牧”，在朝廷设有“夏后氏官百”，^②还建立了奴隶主阶级的武装力量。在夏王朝奴隶制国家建立的同时，也有了法律。《左传·昭公六年》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又说：“三辟（指夏、商、周三代之刑）之兴，皆叔世也”。“乱政”，主要是指奴隶和平民反抗奴隶主的阶级斗争，“禹刑”，是夏代法律的总称。“叔”，是傲的省笔，《集韻·屋韻》：“傲，一旦始也，或作叔”。“叔世”，实为傲世，即开国之初。

夏朝建立后，把天下划为“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九州包括的区域，

① 《左传·襄公四年》。

② 《礼记·明堂位》。

主要是以今天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中游一带，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中原地区。夏朝派“九牧”对这一广大地区进行治理。“牧”的意思是统治人民，“牧”作为执行夏王朝意志，统治一州的地方长官，和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首领有根本的区别。这表明，夏王朝已经冲破了氏族部落的旧制，建立了一套治理国民的行政管理系统。

4000多年前诞生的夏朝，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也是世界史上最早问世的国家之一。与当今世界的苏美两大国比较，从公元9世纪中叶留里克建立诺夫哥罗德小公国作为古罗斯国家的开端，比中国的形成晚了2900多年；从公元1776年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杰佛逊执笔的《独立宣言》标志美国的诞生，比中国的形成晚了3800多年。

民族与国家的诞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1.2 战争：严峻的威胁

然而，当民族和国家从历史的襁褓里问世，面对着的，并非是一个太平盛世或极乐世界。

战争的硝烟，如影硝形般地笼罩着民族和国家。

还在原始社会的后期，氏族部落间的冲突和械斗便频繁起来了。由于采集经济过渡到原始农业，狩猎过渡到畜牧，使人口不断地增多，部落渐趋扩大。粮食和牲畜硝以史存的土地，其价值逐步为古人所重视。“领地占有”是在原始先民中较早就有的一种观念。氏族社会集团形成后，随着生产方式从采集、狩猎向农耕过渡，这种观念愈益增强。人们最

初是依恋自己的出生地和生活地。这种依恋使他们的生活地域渐渐由相对稳定趋于更加固定。终于，领地占有的社会现象产生了。氏族社会的共同特征之一，是每一个氏族都有自己较为稳定的居住、采集、狩猎（而后逐渐发展到农耕和畜牧）的领地，还有共同的墓地。当同一地区的自然资源不够同时供给两个以上的社会共同体的共同需要时，当某个部落为扩大自己不足的“领地”而与相邻部落发生争执时，当因自然灾害逼迫迁徙、或为部落复仇、抢婚等目的进入其他氏族部落领域时，部落之间会发生激烈的暴力冲突——即原始社会的古代战争。这种冲突，自然还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战争特征，只是为了求生存、争夺更多的牧场和耕地而进行的一种争斗。为了争取或保护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部落几乎是全体参战。中国历史上传说的神农与斧遂的战争、共工与蚩尤的战争等，都是发生在这期间的部落战争和部落联盟战争。

在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部落联盟间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中国黄河流域的炎帝、黄帝部落，南方的三苗部落，淮河一带的少皞——蚩尤部落，是当时存在的几个著名的部落联盟。为了掠夺财富，争占土地，相互间发生了几次大的战争。第一次战争，是炎帝部落的共工氏与蚩尤部落的冲突。起因是蚩尤从东向西发展，夺取了共工部落的土地；共工氏“振滔洪水”危害了夷人部落的利益，从而爆发了激烈的战争。结果以蚩尤集团的胜利告终。第二次战争，是黄帝和蚩尤之间的战争。双方大战于涿鹿，因黄帝与炎帝联盟，势力强大，最后蚩尤战败被杀。第三次战争，是黄帝与炎帝部落之间的战争。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炎帝欲

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修振兵”，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同炎帝大战于“阪泉之野”，最后黄帝获胜。从此，黄帝势力日益增强，称霸一时。“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这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掠夺战争的极其频繁。

苏联学者别尔什茨在其主修的《原始社会》一书中，这样论述道：随着苏落管理机构的产生，部落贵族也随之出现了。从部落黄族中通常产生出首侵，其重要任备之一就是领导军事机构，在首领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以战争当作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遇到的问题是社会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战争专业化，这在阶级形成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美拉尼西亚，军事首领的作用最初并不太大，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增高了。在马来塔、乌罗瓦和圣克里斯托巴尔诸岛上，首领这个术语的意思是“伟大的死亡或战争”，说明“在当地人的意识中首领即军人”。在伊洛魁人中间，已经有两个军事首级的职备。在谢内卡人部落的某些氏族中，这种职务是世袭的。战争和民事分工本身还不是普遍现象，因为两样职务经常由一人兼任。然而正是军事首领的职务通常使首领们从其余的氏族——苏落贵族中分化了出来。显而易见，原始的古代战争，对阶级的分化和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苏落间的武装冲突，随着国家的诞生而发展为一种大规模的战争。“古代苏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侵取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①“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经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4页。